

SHIJI XUEREN

第五卷

ZISHU

高
增
德
丁
东
编

世纪学人



自述

他们
构成了一幅
20世纪
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
全景图

他们的心路历程
集中地
浓缩着
民族的精神历程

学者集体的心路
就是民族的心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五卷

高增德丁东编

立
纪
学
人
自
述

费
孝
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学人自述 (第五卷) / 高增德, 丁东编.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2-0559-5

I. 世… II. ①高… ②丁… III. 学者-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313 号

世纪学人自述 (第五卷)

SHIJI XUEREN ZISHU

高增德 丁东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125 印张 350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2-0559-5

I·451 定价: 19.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辑入了本世纪中国学术上垂范当代的两百名社科学者的自述。所选学者生于 1888—1936 年间，以生辰为序，分为六卷。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著述接武先哲，启牖后学，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对于关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演进史及学术发展史的读者，本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卷收有王瑶、周祖谟、徐中玉等三十七位学人的自述。

序 言

高增德 丁 东

20 世纪快要结束了。在告别 20 世纪之时，我们把这套六卷本的《世纪学人自述》奉献给读者。

本书是二百位社会人文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全景图。有人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民族的大脑，那么社会人文学者，应该是民族大脑中最具有理性的部分。他们的心路历程，自然集中地浓缩着民族的精神历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学者群体的心路，就是民族的心路。

进入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显学。反思本世纪中国人走过的道路的书籍，也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就知识界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社会关注；就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理性的觉醒。在行将步入新的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具有反思历史的自觉，认真回顾一百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前瞻 21 世纪的进程。

由中国古代的学术与西方的近代学术碰撞而产生的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诞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展至 30 年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学科分类

和相当的研究规模，产生了诸多的学术流派和富有活力的学术传统，出现了一批堪称一流的研究成果。然而，到 50 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失去了自身的特点，被改造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有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在“反右”以后干脆被取消。到了“文革”时期，文、史、哲、经，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工具，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喇叭筒，不管是有名无实的学科，还是无名无实的学科，到此已经停止了学术生命。直到 70 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社会人文学科才得以起死回生。各学科的重新建设大约开始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大体上已经全面铺开，过去有过的学科又都恢复了，国际上有而中国没有的学科也建立了，甚至一些中国独有的学科也产生出来。然而，比起学科的恢复，学者的人格和学术自信的恢复，大约还要晚十年。老一代学人经过“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生存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哪还有健康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到了 80 年代初，心态还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下子找不回当年的学术自信 and 风采。中年一代的学者从教条主义的阴影下挣脱出来，想要冲破思想的牢笼，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直到 90 年代，“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才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身体力行。内伤的深重，使中国社会人文学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才重新与曾经有过的学术传统接轨，同时敞开怀抱，呼吸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八面来风，使得社会人文学术重新走向兴盛。收入本书的二百位学者自述，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曲折的发展轨迹和坎坷的奋斗历程。

本书的启动，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底。当时高增德筹备创办《晋阳学刊》杂志，设计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

栏，向健在的老年学者约组自传，同时也请学生和亲属为先哲立传。当时的着眼点，首先是抢救史料。那些成名于20年代到40年代的学者，一部分没有熬过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已经过早地辞世，健在者也年逾古稀，乃至过了耄耋之年。请他们留下第一手的叙述，成了当务之急。有的学者年老体弱，已经不能执笔，只好口授整理。有的学者刚刚写完自述，就驾鹤西去。这二百位传主，一半以上已然作古。这些自述的成稿年代不一，其中有一部分完成于80年代初期，当时有的传主经过多年失语，尚未完全恢复学术自信。如果晚几年写，他们的思想可能更为解放。然而，自然规律又不容许我们等待。所以，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免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大病初愈的特点。虽然今天的读者可能感到不尽如意，但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价值。一些学者心态逐渐开放，后来撰写的自述，就不只具有史料性，同时具有现实的思想性了。因为是自传和他传同时组稿，有些重要的学者，当时有他人为之作传，所以没有约写自传；因为本书纯属民间行为，有些重要的学者，没有联系上。这些缺欠，只好等本书有进一步扩大规模或增编续集的机会时来弥补。

本书的编排，以传主的年龄为序，而不按传主从事的专业分类，主要不是因为有些传主跨越几个专业，不好分类，更重要的是希望形成一种历史感。那些出生于上个世纪末，亲身感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是第一代；出生于本世纪前一二十年，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是第二代；出生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学术活动的是第三代。虽然每位学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同代人的命运却有颇多相似之处。学术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聪明才

智的发挥，很难不受这种大环境的制约。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感喟。本书的传主，以第二代为多。而一些第一代的学者自述，当时没有抢救得到，不免留下永远的遗憾。

这些自述，对于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有独特的价值。本书的大部分传主，在本学科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自述，反映了那个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学理，讲述了他们的师承、交流和治学经验，这是学术史方面的价值；这些学者还叙述了求学的经历，早期的讲到旧式的私塾和本世纪最早的新式学堂，一些人讲到留学的经历，许多学者还有执教的经历，这是教育史方面的价值；其中一些学者参加本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思想论争，有的还是论争中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回忆，为思想史留下了重要的证言，这是思想史方面的价值；在 20 世纪中国，学人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也曾在全能政治的环境中，失去了独立的社会角色，这些自述，反映了学者阶层的命运变化，这是社会史方面的价值。

最近几年出版的学者传记、年谱或评传日渐其多，但我们还是感到自传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自传、日记、书信都是第一手资料。虽然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也需要辨析，但毕竟是其他研究工作的原始依据。没有原始材料做基础，其他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这就是我们格外看中自述价值的理由。书中多数自述附有著述目录，均按原貌刊印，未求格式统一。

这些文稿的出版经历了许多周折。80 年代初，就有一家出版社与高增德合作开展这项学术工程。先是面对僵化思想的禁锢，审稿每每遇到阻力，后来又面对市场压力，严肃纯正的学术书籍印数骤减，再加上当时经验不足，过于相信君子协

定，该出版社易人毁约，使这项学术工程半途而废。多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慧眼识珠，诸位编辑鼎力推动，使得这套《世纪学人自述》得以面世。在此我们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虽经努力，我们至今尚未与一些作者取得联系，恳请这些作者或家属尽快将通讯地址告诉出版社，以便奉寄稿酬。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费孝通先生题写书名，感谢那些提供自述的学者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与宽宥。对于一百多位故世的传主，我们只能追怀他们的成就与业绩，把他们的告白传诸后人，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目 录

- | | |
|--------|-------|
| 【 1 】 | 吴于廑自述 |
| 【 13 】 | 章 巽自述 |
| 【 28 】 | 王 瑶自述 |
| 【 32 】 | 张毕来自述 |
| 【 42 】 | 孙昌熙自述 |
| 【 52 】 | 周祖谟自述 |
| 【 72 】 | 秦佩珩自述 |
| 【 93 】 | 吴调公自述 |
| 【 97 】 | 金宝祥自述 |
| 【106】 | 徐中玉自述 |
| 【115】 | 杨志玖自述 |
| 【142】 | 崔克讷自述 |
| 【151】 | 钱剑夫自述 |
| 【177】 | 陈诗启自述 |
| 【193】 | 周法高自述 |
| 【202】 | 郑子瑜自述 |
| 【219】 | 詹 鏊自述 |
| 【230】 | 袁 珂自述 |
| 【242】 | 高华年自述 |
| 【252】 | 牙含章自述 |

【263】	谷 苞自述
【279】	李宝震自述
【290】	赵俪生自述
【293】	刘逸生自述
【300】	陈奇猷自述
【314】	程应镠自述
【327】	杨生茂自述
【337】	宋则行自述
【344】	吴 江自述
【351】	李匡武自述
【364】	马茂元自述
【367】	刘开扬自述
【378】	韩国磐自述
【390】	姜丕之自述
【411】	杨公骥自述
【442】	夏东元自述
【452】	张世英自述
【464】	索 引



吴于廑 自述

吴于廑，原名吴保安，今以字行。1913年生。祖籍安徽休宁。童年及少年时期，在江苏运河东岸的一个小县城宝应入学成长。家无中人贍，中学教育时断时续，很不完整。1931年高中毕业时，因获奖学金得以升入东吴大学。1935年大学毕业。毕业后直至抗日军兴，在东吴附属中学任教。1939至1941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经济史。1941年秋，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赴美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1944年及1946年，先后在哈佛获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以迄于今。解放后三十多年来，除在武汉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和先后兼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行政职务外，还担负多种社会工作，包括史学会及世界史一些分支学科学会理事、理事长、执行主席，武汉市、湖北省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武汉分社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等。1979年，经武汉大学党委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几十年来在学术上的成绩微不足道。写了一本《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小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初

版,1962、1979年再版)和若干篇论文。论文内容多属世界上古及中古史,其中涉及经济史的如《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涉及法制、政制史的如《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载《历史研究》,1957年)、《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载《历史教学》,1957年)等。另有一些文章评论西方史学和某些有关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学术观点,如《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感》(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载《江汉学报》,1964年)等。这些论文大体上说明我的学术兴趣的两个方面。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我和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等共同主编《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1973、1980年再版)以及配合此书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62年初版,1974年再版),用力较多的是上古及中古部分。其所以又承担《外国史学名著选》(已出九种,商务印书馆,1962—1964年初版,1980年再版六种)的主编,并担任其中普鲁塔克《传记集》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两种的选译,原因之一是我对西方史学思想及其发展有兴趣。近年为研究生讲课,主要讲的也是近代西方史学。我常常这样感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专门研究上的多方面的积累,已经为世界历史的比较、综合研究准备了可以认真着手的条件。

二

1938年冬,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

之后，我到达了昆明。当时昆明已经设立了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先生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由于朋友的介绍，我见到了陈先生。陈先生同我谈话约一小时，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有的涉及东西方对知识的看法。谈话将要结束了，他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陈先生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气度舒徐，善于体察人，让人感到明达而又易于接近。后来他历任岭南、中山、暨南、南开诸大学校长、副校长，其所以能够做到知人善任，罗致并团结了不少知名学者同他共事，我想必定和他为人的这种气质有关。他同我仅仅作了一次谈话就决定收我作研究生，这对我确实是出乎望外。我后来自己也做点大学的行政工作，常常想起陈先生的行事。陈先生爱护后进，从不吝惜给青年以增长和发扬才能的机会，这一点给我的影响很深。我有心学习他，但远远没有学好。

一个青年受前辈的影响，还往往是由于片言只语。当陈序经先生决定收我为研究生的时候，我感到犹疑，说：“在大学读历史的，能进经济研究所吗？”陈先生答复说：“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他还说他自己就是转了弯的。陈先生这几句话，其实是不少学者的经验，我当时听后不但觉得新鲜，而且不用多做解释就为之说服了。于是决心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打算学点经济史，试着在学术上转弯。后来渐渐体会：所谓转弯，就是踏进一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多转几个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看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是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是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学

历史的人，我觉得，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这在当时，自然还没有很清楚地想到。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两年有余，读了经济史也读了各家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夏尔、钱贝伦等，在大学本科时有的仅知其名，有的不知，这时都读到原著。也读历史和经济地理，重点几乎都放在西欧。随着对西方知识的增多，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就是以西方与中国做比较。学历史宜做比较研究的思想由此萌芽。南开研究所的师长们，当时对我的培养方式可谓开明，不仅允许我选择一个不属经济学范围的研究课题，而且让我到白沙编译馆去利用那里的藏书，写作一篇关于士与古代中国统一运动的历史论文。这篇论文稿已在十年动乱中散失。就记忆所及，其主旨在说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各封建诸侯国家在实行君权集中、抑制和打击旧贵族这一历史运动中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这个力量又对此后的历史起了什么作用。文章认为这个社会力量是士。士的流派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经济主张却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点。他们在经济上多倡农本之说，以维护和发展农耕为国家长治久安之本。在政治上他们多主张尊君统一，选贤与能，以人的才能而不是以人的血统论高下，允许人做聪明才智的竞争，在竞争中攀登社会的阶梯。士的这些主张适应了当时君权集中的要求，因而形成君权与士的结合。这个结合促使层次分封的诸侯国演为集权、并立的诸国，最后形成统一国家，社会上以士居先，经济上以农为本，经历了长期的稳定。文章把这一历史运动与西欧封建国家的统一运动做了对比。西欧诸国在封建后期王权集中过程中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新兴资产阶级，形成了君权与资产阶级的结合。这个结合对世袭封建诸侯势力的打击和最后摧毁，实际是为资产阶级的工商活动解除约束，在统一国家的广阔范围里进行经

济的自由竞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就是最后为这种自由竞争奠定理论张本。论文写完之后，我出国留学。后来听说这篇论文受到前辈学者吴景超先生的注意，曾经为文评介。但这点我在国外全无所知，因而无从获得教益。现在回忆这些，并不是说所做的这种比较是恰当的，有助于对东西方历史的理解的。当时对东西方“封建”这个词的含义以及能否把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与西欧中古时期的封建国家做比较，没有做过理论探讨；对土没有进行阶级分析；对西欧一些统一国家形成后在实行自由经济竞争的同时，是否也有聪明才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从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的人本主义思潮加以考察。立论不善，殆无可免。现在回忆的，主要只在于一点，即在青年时期的所谓学术转弯之中，开始有了对历史做比较研究的想法。

40年代初期，在哈佛听查利·麦凯尔文教授讲西方政治思想史，涉猎到一些有关中古前期西欧封建诸国君权和法律的书籍。按陈序经先生的说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学术转弯。读了这类书和资料之后，觉得很有一些问题可以与我国周代分封的诸侯国做历史比较研究。西欧中古前期日耳曼诸族建立的国家，其国君无立法权。国君是政长和法官，但非立法者。法律不成文，起源于风教习俗，不知始于何时何人，愈古愈有权威。解决法律上的疑问，或征之旧习，或询之耆贤。在位之君，视现成之法为先王之法，有遵守之责，无更废之权。偶有创制，亦必托名于旧法之恢复。立君的要素有三：天命、血缘继承、人民拥戴。所谓“拥戴”，实际是原始时代酋长选举制的遗留。以上述各点考察中国古代成文法出现前周代封建诸国的君权和法律，接近或类似之处，稍作爬梳，历历可见。把国君奉为超乎法律之上、其本身是法律之源的专制统治者，在我

国古代，主要出自比较后起的法家的理论。在此以前，“礼治”之下的国君，对于那些无文献足征亦即尚不成文的、作为社会风教法制总和的先王之“礼”，既不能违反，也不能更制。国君登位的根据，除了托之天命，有无可争议的继承权，也还要看人民的意向。这一点，不叫“人民拥戴”，叫做“民之所归”，其实也是原始的淳朴选长制依稀垂存于历史的余风。由此粗略的比较研究，我形成一个自己觉得是不无意义的看法，即古代中国之有君主专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非自有君权之始即已如此。在出现君主专制之前，有相当长的时期君权是受约束的，不是无限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西方某些学者论“东方专制主义”，仿佛这是一个和中国历史相终始的怪物，但实际并不如此。这个看法我至今不悔。

不过有一点应当指出：把西欧中世纪前期的君权与法律和我国周代分封的诸国君权与法律相对比，其前提是承认两者都是属于封建时代的。这涉及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我当时对此确未做过任何研究。但在实际上，我在那时可说是一个自发的西周封建论者。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时所做关于君权集中问题的比较，同样是从这个自发的论点出发的。

三

1947年回国来武汉大学，怀之有年的用比较法研究东西方历史的想法，搁置了下来。解放以后，我在武大担任世界通史古代部分的教学，稍后参与《世界通史》这部书的主编。在工作中，我碰到两个涉及史学思想的问题，都与引进的外国学者著作中的观点、理论有关。一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一是机械运用历史分段法、把各国历史分段排列的那样一派世